



影响力书系

超越人口红利

BEY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多年前他做出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和“人口红利开始式微”的判断曾遭到质疑和批评
现今，“民工荒”、招工难、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使得预言一步步成真

我们还能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盛宴吗？

劳动力价格上涨会不会让我们丧失比较优势？延长退休年龄是否会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改变？

蔡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影响力书系

超越人口红利

BEY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蔡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人口红利/蔡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97 - 2546 - 7

I. ①超… II. ①蔡… III. ①劳动力 - 供求关系 - 中国 - 文集 IV. ①F249.21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5412 号

超越人口红利

著 者 / 蔡 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刘志强 恽 薇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玉清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9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546 - 7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最初是从沿海地区到全国范围的“民工荒”，随后伴之以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连续多年上涨。说“难以理解”，是因为在许多人的理念中，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是中国社会天经地义、恒久不变的特征。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自 2003 年初现之后，就再也挥之不去，而且工资上涨也成为一个个次生现象，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更加真实。

这个不期而至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恰好符合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一个发展阶段的描述，即“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因此，它意味着一个经济发展转折点的到来。由于上述描述是针对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的，而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又是与刘易斯教授的名字相连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转折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

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线观察者，我及时做出了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也因此而受到广泛的质疑。不过，直到最近，在很长时间内，持反对意见（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人，通常未能提供充分的经验证据。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进行经验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这个阶段性变化的判断。这些工作中的一部分，就是与刘易斯转折点相关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其结果之一，即劳动



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通过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度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其经历了长期的下降过程之后，下降速度已经放缓，并预计在 2013 年见底，随后转为上升的过程。那就是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个判断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相辅相成的。毫不奇怪，这个判断同样遇到诸多异议。

虽然时间对我是有利的，日新月异的现实不断消除着人们对于阶段性变化的怀疑。但是，争论仍在继续，焦点则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做出任何判断的证据问题；第二是判断本身所引申的意义；第三则是如果做出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有怎样的政策含义和应对之策。为了回应反对者的各种质疑，也为了回答赞成者的相关询问，我一方面继续做经验性研究，在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另一方面也应各类报刊之约，撰写了一系列短论，尝试用较少学究气的风格讨论上述问题。这个集子，便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的汇编。

遵照编辑的建议，这本文集按照七个板块依次编排，前六篇分别反映同一主题的六个角度。它们是：第一篇“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第二篇“人口红利盛宴即将终结”，第三篇“中国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第四篇“刘易斯转折点到达后的就业挑战”，第五篇“深度城市化与区域均衡发展”，第六篇“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后一篇即第七篇，收录了若干篇经济学随笔。为了阅读的延伸，我们在其中的六篇各附录了一篇记者的采访文章，取其直截了当回答问题之特点。另外，在每一篇还各加入一篇略为学术性的论文，以便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和经验证据。这种编排，目的在于尽可能弥补论文集缺乏系统性的缺陷。

世界经济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过去成功的发展，并不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成功买下保险。特别是当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以往成功的做法已经不能保证其可以继续一路凯歌前进。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由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必将面临诸多的严峻挑战，存在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才能突破潜在的“陷阱”，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希望这本文集收录的这些拙作，能够对广大读者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有所裨益。



前 言 / 1

第一篇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 / 1

中国经济要通过多少“转折点” / 3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及其政策意义 / 6

【记者访谈】中国经济在新关口 / 11

【延伸阅读】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 15

第二篇 人口红利盛宴即将终结 / 33

“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坏事 / 35

中国如何应对“未富先老” / 37

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 41

【记者访谈】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 49

【延伸阅读】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 58



第三篇 中国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 /71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 / 73

“民工荒”昭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新格局 / 78

对“用工荒”现象不必忧虑 / 83

冷静看待和积极应对劳动关系变化 / 86

【记者访谈】劳动力价格上涨，是挑战更是契机 / 89

【延伸阅读】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 / 93

第四篇 刘易斯转折点到达后的就业挑战 /111

我国就业形势的新特点 / 113

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趋同说明什么 / 116

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 120

【延伸阅读】成长的烦恼：中国在刘易斯转折期间面临的就业难题 / 125

第五篇 深度城市化与区域均衡发展 /143

中国城市化的潜力在哪里 / 145

谨防中西部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 151

深度城市化：未来经济增长引擎 / 157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两个事实和两个模型 / 160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多样性——重庆改革的启示 / 165

【记者访谈】中西部地区——“未富先大”的缩影 / 169

【延伸阅读】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 / 173

第六篇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 187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与新挑战 / 189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要求教育优先发展 / 196

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做好人口工作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思考 / 200

“十二五”时期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 205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症结何在 / 213

【记者访谈】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 218

【延伸阅读】“十二五”时期中国需要警惕的战略性错误 / 223

第七篇 经济学随笔及其他 / 233

怎样构造经济理论 / 235

怎样传播经济理论 / 24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 248

创建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 252

经济事实是关于一致性的故事 / 255

【记者访谈】执著于简单的穷人经济学家 / 258

【延伸阅读】新古典经济学思维与中国现实的差距

——兼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建 / 263

超越人口红利

第一篇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

中国经济要通过多少“转折点”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近年来经常谈到的话题是“转折点”或者“拐点”：楼市或股市发生方向性变化时，人们讲“拐点”；出现“民工荒”了，人们也讲“拐点”……在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我们究竟要经历多少转折点？每个转折点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其实，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只有三个，全部通过之后，中国经济就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了，中国的老百姓就真正富裕了。在介绍这三个重要转折点之前，我们先来描述一下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通常是什么样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上是由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两个部门组成的。在前一个部门中，相对于土地等生产要素来说，劳动力十分丰富甚至是严重过剩的，所以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远远低于后一个部门。与此同时，现代经济部门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用很低且不变的工资水平，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吸引出来。对于这个部门来说，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所以它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和扩大，完全取决于它的资本积累能力。这就构成了我们熟知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注意，由于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所以，直至这个特点消失，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几乎难有实质性的提高。不仅如此，由于资本积累成为增长的唯一瓶颈，那些有志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往



往采取各种手段帮助实现资本积累，因此，经济和社会政策常常会产生一个偏向，即保护投资者而不是劳动者。换句话说，在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少数例外，我们难以看到收入分配明显改善的情形。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描述了这种现象：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收入分配没有得到改善，在一定时期反而倾向于恶化。

幸运的是，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个部门中的传统农业经济部门是逐渐缩小的，而现代经济部门则是不断扩大的，推动这个过程的重要机制就是劳动力从前一个部门向后一个部门的持续转移。恰恰是这个劳动力转移，把我们依次引向三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现代经济部门的增长速度快，它吸引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就快。而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在下降，这反映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相应下降上面。于是，终究有一天，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会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这时，虽然劳动力依然丰富，但过剩的程度却降低了，现代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如果维持相同的速度增长，就必须提高工资。按照刘易斯自己的定义，这可以叫做“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现为与以往相比，虽然劳动力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短缺，却不再是无限供给了。更重要的是，企业开始竞争劳动力，其结果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

第二个转折点。库兹涅茨在总结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时，并没有断言收入分配恶化的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是描述了一个倒U字形的变化轨迹，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扩大到一个最高点之后，便会转向缩小的阶段。因此，库兹涅茨转折点是一个收入分配开始改善的转折点。虽然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在各各国不尽相同，但是，它通常是与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相关的——既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初步消失导致工资提高，既然普通劳动力收入状况的改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两个转折点在逻辑上必然是重合的。我们之所以不说两个转折点是完全重合的，而只是说逻辑上是重合的，是因为究竟两者能否在现实中实现重合，归根结底还要取决于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政策。如果政策顺应发展阶段的变化，即一方面通过必要的规制，加强对劳动

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维护市场的自然选择，提高劳动力转移的激励机制，那么，两个转折点的重合就是逻辑与现实的一致结果。

第三个转折点。这是前两个转折点的必然却遥远的结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使我们了解到如果不提高工资，劳动力会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加上政府政策方向的转变，会迎来收入分配改善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在更好的激励机制和手段下，劳动力仍会从生产率相对低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现代部门转移，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有差异为止。那时，我们就迎来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消失，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完成。

有人说，认识经济现象只需使用三板斧。上述三个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就是这样的分析工具。以其作为参照系，我们可以知道今天观察到的“民工荒”，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发展现象；可以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具有何等的阶段性意义；也会认识到加快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终把我们带进一个一元化的现代经济到底有多重要。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 判断及其政策意义

对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是 2007 年被记者炒作出来的，实际上其提出的时间还要早得多。虽然大多数同行都持相反的意见，但我始终正面做研究，不与人辩论。原因是持反对意见的人基本没有做同样分析，他们提出的都是观点和判断。没有严肃的数据工作，讨论就不能建立在可辩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亚洲开发银行，专门召开了以刘易斯转折点为主题的研讨会，主要是组织力量批评我的观点。不管怎样，这也足以证明这个判断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和亚太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

按照刘易斯的定义，转折点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绝对不足，而是不再能够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雇到需要的劳动力了。按照这个定义并根据我们现在的观察，我建议在政策研究中不要再怀疑这个结论。至于学术界，研究的性质是求异存同，随便大家争论。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与否，在政策上是有意义的。我当时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绝没有低估就业重要性的意图，只是着眼于提出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工资的上涨必然加快；第二，工资关系要发生剧烈变化；第三，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现在问题越来越明显了，我不在乎谁对谁错，但是，希望引起决策部门对相关现象的关注，特别是运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应对。不赞成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政策制定者，担心的是人们因此对现实中的就业压力掉以轻心。我很理解，但

是，事实越来越证明，承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只会把观察问题的思路放得更宽，不会使任何人得出就业工作不再重要的结论。

刘易斯转折点以及政策意义

刘易斯拐点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看，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逐年减少，2004～2011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新形势，可以用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概念来描述。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是坏事，而是二元经济结构消失的前奏（尽管从该拐点到二元经济结构消失之间的道路是漫长的）。其相应的表现是：①不断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这一长期因素的作用，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结构性、局部性的因素来解释“民工荒”了。②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最近的涨薪潮是2003年以来趋势的延续，与人口因素导致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新生代农民工预期直接相关。此外，还与农村家庭生活改善相关。③劳动关系变化的新倾向，表现为劳资冲突加剧。

最近英国《经济学家》报道了这个争论，由于我没有接受采访，他们主要依据我以前的文章以及外国学者的转述做了介绍。该文认为中国的转折点有早熟的嫌疑。刘易斯本人的确设想过几种转折点早熟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中国的不是早熟。迄今为止，工资上涨并没有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第一，过去10年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大体上是同步的。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这个原则，今后也应该严格遵循这个原则。其实，日本当年实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强调了应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支撑。

第二，由于更早的时期，工资的提高跟不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因此，这个出现“民工荒”的时期，存在一个可以让工资更快上涨的空间。这正是调整收入分配、提高两个比重的大好时机，对于改善一次分配的格局是求之不得的，千万不要叶公好龙。



劳动力市场上的困难群体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绝不意味着就业困难的自然消失。高度关注就业，也并不一定要以劳动力供大于求为前提。相反，从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总量，转向更加关注主要就业困难群体，可以使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金融危机时期，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困难给予了高度关注。因为这三个群体分别对应着三种类型的失业或就业困难（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所以抓住这三个群体的就业问题，就真正瞄准了劳动力市场新格局下的主要问题。

农民工的就业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经营，使得农业用工数量大幅减少。2002 ~ 2008 年，水稻、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的每亩用工减少了 1/3 左右。二是农民工代际更替，超过 60% 的农民工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务农也不打算务农，这都导致劳动力转移是不可逆的。

农民工面对的就业困难是易受周期性失业的冲击。2009 年春节农民工的提前返乡和 2010 年春节后的“民工荒”，都反映了这种周期性。稳定他们的就业，提供与市民相同的劳动力市场保护（如各种社会保障和就业扶助），显得十分紧迫。由户籍制度改革带动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可以产生综合推进的效果。

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主要就业困难是结构性的，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就业预期与现实的不一致。教育结构的合理调整、高等教育改革和培训等就业服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至于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他们的特征是年龄偏大、缺乏技能更新，他们在经历下岗后，大多在非正规岗位实现了再就业。因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面临的是自然失业风险，是结构性、摩擦性困难，所以对于这个群体的扶助重点在于提供培训和职业介绍等服务，以及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

劳动关系变化趋势

欧美国家和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劳动关系急剧变化。伴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新形势，工人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等维权意识增强，而企业改善意愿不足，这必然会形成就事论事性质的局部劳资冲突。

可见，我国目前出现的停工等劳资冲突是具有规律性的，也是必然发生的，应该被看做一种“成长中的烦恼”，不应回避也不可能回避。更一般地说，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丝毫不亚于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提升阶段。通常，当一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后，劳资冲突会因之诱发出来或者说显性化。与此同时，老百姓对收入改善的期望值提高，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群在调整中会遇到困难。例如，在美国的制造业转移到国外的过程中，许多原来的普通工人找不到新工作。每次因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出现制造业大量转移时，经济往往伴随着无就业复苏。有人建议我们不要用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办法解决，以避免引火烧身。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无视或压制劳资冲突，是一种鸵鸟策略。

欧美、日本、韩国等已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许多国家却长期停顿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成长中的烦恼。拉美的失败在于，这些国家常常采取了承诺过多、引起民众更高预期的民粹主义政策，但是，它们既不敢损害既得利益，又难以兑现承诺，收入分配反而恶化，因而只好又采取高压政策，导致社会动荡。而那些发达国家在劳资摩擦加剧的时期，艰难痛苦地建立了完整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了解决劳资争议和对立的制度框架。虽然这种选择是有成本的，但是别无他途。只有用劳动力市场制度来规制和协调劳资关系，才不会把劳资对立转化为企业和职工对政府的不满。

2004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用立法、执法、最低工资制度、工资指导线等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在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社会保护，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西方国家一直试